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AMI综合评价”入库集刊
复旦大学“学术期刊质量提升支持计划”资助立项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7, Issue 2 (2021)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十四辑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十四辑/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3.12

ISBN 978-7-5012-6701-9

I. ①中… II. ①复…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822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227588号

书 名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十四辑 Zhongguo Zhoubian Waijiao Yanjiu · Di-shisi Ji
编 者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罗庆行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33645(市场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6%印张
字 数	308千字
版次印次	2023年12月第一版 202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6701-9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集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集刊已被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Wanfang Data）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使用费与本集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著作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集刊声明，本集刊将做适当处理。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主管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主办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主编 赵卫华
副主编 包霞琴 祁怀高 薛松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	石源华	复旦大学
卢光盛	云南大学	归咏涛	北京大学
包霞琴	复旦大学	关培凤	武汉大学
祁怀高	复旦大学	李皖南	暨南大学
杨健	复旦大学	杨鲁慧	山东大学
吴心伯	复旦大学	吴寄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日本] 青山瑠妙	日本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赵卫华	复旦大学
赵可金	清华大学	赵青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赵明昊	复旦大学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费晟	中山大学	夏立平	同济大学
郭锐	吉林大学	薛松	复旦大学
魏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马来西亚] 黄子坚 (Datuk Danny Wong Tze Ken)
马来亚大学 (University of Malaya)

编辑部主任 温尧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 ccrc@fudan.edu.cn

电话: 86 21-6564 2939

传真: 86 21-6564 2939

地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文科楼307室复旦大学中国与
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邮编: 200433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赵卫华 / 1

周边形势

美国“印太战略”、“中国因素”与美印互动..... 杨晓萍 / 11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

地方外交在中国—文莱合作中的角色与展望..... 罗传钰 支鹏宇 / 33

失落的“蜜月”：结构性错误知觉对中国周边战略失稳的影响
——以2016—2017年中韩关系为例..... 方炯升 / 51

周边国情研究

大变局背景下越南的对外战略与政策走向探析..... 顾强 黄坚 / 81

从越南涉南海话语宣传看越南对华策略的对冲性..... 阳阳 / 104

论韩国在朝美之间的斡旋外交——以文在寅政府执政前期的斡旋为例
..... 李家成 张翊梁 / 121

新冠疫情下的地区问题

《贸易联系与供应链韧性：应对新冠疫情新常态》（节选）
..... 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学者 / 151

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政策的扩散——基于实践理论的视角... 杨嘉宜 / 180

中国周边外交

中国—东盟关系30年与中国周边外交发展..... 郭志奔 / 205

会议综述

第十一届复旦大学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综述..... 张 婷 / 229
第五届“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国际研讨会综述..... 张泽宇 / 238

附 录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简介..... / 247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征稿启事..... / 249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稿件体例及注释规范..... / 251
审稿专家致谢..... / 256

Contents

Preface..... *ZHAO Weihua* / 1

Situation of Neighborhood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a Factor” and U.S.-India Interaction
..... *YANG Xiaoping* / 11

Research on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Role and Prospect of Local Diplomacy in China-Brunei
Cooperation *LUO Chuanyu and ZHI Pengyu* / 33

A Missing “Honeymoon”: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Misperception
on Strategic Instability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
tries—A Case Study of China-ROK Relations in 2016–2017
..... *FANG Jiongsheng* / 51

Research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alysis of Vietnam’s Foreign Strategy and Policy Dir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at Change *GU Qiang and HUANG Jian* / 81

Research on the Hedging of Vietnam’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from
Vietnam’s Propaganda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YANG Yang* / 104

A Study on ROK’s Mediation Rol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DPRK-US Relations—Take the Moon Jae-in Administration’s Me-
diation in Its Early Years as an Example
..... *LI Jiacheng and ZHANG Yiliang* / 121

Regional Issues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 Trade Linkages and Supply Chains Resilience: Navigating the COVID-19 New Normal* (excerpt)..... NACAI scholars / 151
- The Diffusion of Public Health Policies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A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heory YANG Jiayi / 180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Thirty Years of China-ASEAN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GUO Zhiben / 205

Reviews on Symposiums

- Review on the Eleventh Fudan Symposium o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ZHANG Ting / 229
- Review on the Fifth NACA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ZHANG Zeyu / 238

Appendix

- Introduction on Center for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Fudan University (CCRNC Fudan)..... / 247
- Notice Invi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49
- Standards of Articles and Annotations of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51
- Acknowledgements to Reviewers..... / 256

从越南涉南海话语宣传看越南对华策略的对冲性

阳 阳

【内容提要】在东亚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和大国关系重组的变局下，越南依托全方位外交政策，在南海问题上一方面不放弃与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引入美国等域外国家在安全领域对中国进行有限的制衡，呈现出对冲的表象。通过对2019年、2020年越南官方媒体越南通讯社涉南海问题英文报道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判断越南对华策略具有对冲性，目的在于对冲历史上业已存在的地缘风险。就其特点而言，越南对华风险认知强烈而不极端，策略构成以间接制衡、全面下注为主。这一策略对中越关系良性发展造成阻碍，但也受到中越双边关系合作机制的限制，与《东盟印太展望》所反映的多边主义主张基本吻合，对增强东盟共同体的中心性与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越南；南海；话语；对冲

【作者简介】阳阳，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广西民族大学越南研究所研究员。

一、引言

自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大国关系的重组给东盟国家带来新的两难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外关注东盟研究的学者将目光集中于东盟整体的对外策略，并普遍认为东盟作为区域共同体选择了对冲战略来削减这种困境中存在的风险。对于东盟而言，均势、联盟、中立战略限制了自身对

外战略空间，具有无法避免的局限性。而对冲战略是不同于制衡、追随和中立的策略组合，具有灵活性、自主性等特点，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实现。与上述系统层次的研究相对应的是集中于以国家作为主体的单元层次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东盟成员国都采取了对冲战略，只有未同美国结盟且与中国没有重大安全分歧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文莱采取对冲战略，其余国家都在制衡中国。^① 导致系统层次与单元层次结论分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际关系中的“对冲”概念尚未完全明确，以吴翠玲、郭清水、古贺庆、王玉主等为代表的学者对“对冲”概念进行了不同角度的界定；二是东盟尚未具备超国家一体化的特点，系统层次的东盟策略难以作为统一意志覆盖国家单元层次的东盟成员国。也就是说，即使东盟作为整体采取对冲策略避免选边站的风险，也不能就此判断单个成员国也采取了对冲措施，或者目的也是对冲选边站的风险。

上述问题同样反映在以越南作为对象的研究中。目前学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越南面临中国的迅速崛起与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变局，越南奉行全方位外交政策，同时与多个国家展开交往，以满足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的不同需求，避免任何一个大国对其产生支配性影响，最大化地实现国家利益并维护自身的独立性。^② 而在中越南海问题上，越南也同样采取与多个国家积极开展外交的策略，一方面不放弃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另一方面引入美国等域外国家在安全领域对中国进行有限的制衡，呈现出对冲的表象。那么，是否可以据此判断越南对中国采取了对冲战略？或者更准确地说，越南对华策略是否存在对冲性？如果存在对冲性，进一步的问题是越南究竟在对冲什么风险？这种对冲性具有什么特点？对中越关系与地区态势会产生何种影响？

由于越南对华策略寓于其全方位外交政策之中，对上述问题的全面解答将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我们不妨从其外交话语层面进行一个侧面角度的探讨，尝试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在越南的外交话语建构中，南海问题是其始终关切的重点，尤其随着中国的崛起，中越之间的南海争端也数次升温，可视为把握越南外交话语的一个切入点。而就外交话语的载体来看，鉴于越南的政治体制特点，其官方媒体充当了外交话语的传播者，相关报道对于中越南海争

^① Darren J. Lim & Zack Cooper, "Reassessing Hedging: The Logic of Alignment in East Asia," *Security Studies* 24, Iss.4 (2015): 696-727.

^② Shannon Tow, "Southeast Asia in the Sino-U.S. Strategic Balanc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6, no.3 (2004): 434-459.

端的“事实”塑造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并反映了越南政府真实的对华策略。其中，越南通讯社（简称“越通社”）扮演着宣传政府政策、态度与立场的官方媒体角色。它由越南政府直接领导，报道信息量大、内容翔实，较为真实地反映了越南官方的立场和态度。除此之外，语言也是必须考量的因素。不同语言的新闻报道面向不同的受众，相比针对华语群体的中文报道，英文报道的受众主要包括英语母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更为准确地反映了越南面向国际社会表达的涉华信息与对华立场。而在时间上，2019年、2020年是越南积极筹备与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完整周期，利用东盟这一平台，越南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更加主动的作为，积极推动南海问题成为地区与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

综上所述，笔者试图通过对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的越通社涉南海问题英文报道进行梳理与分析，以期探讨越南对华策略是否存在对冲性，以及这种对冲性的特点与影响如何。

二、对越通社涉南海英文报道的量化分析

（一）报道的数量变化及特点

以“bien Dong”^①为关键词将越通社官网从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发布的英文报道进行筛选，并选择其中与南海问题相关性较高的报道按照月份进行数量统计，得到报道数量曲线变化情况（见图1）。

^① 中方称南海，越方称“biên Đông”，英文写作“bien D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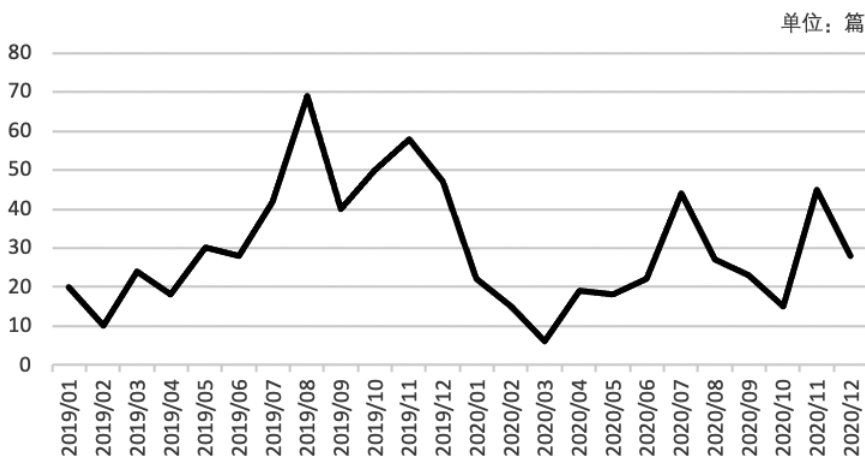


图1 2019年和2020年越通社发布的涉南海问题报道数量曲线变化

从图1可以看出，2019年和2020年越通社发布的涉南海问题报道数量曲线呈高低波动变化，而且具有一定相似性：持续上升的情况较少出现，变化曲线通常在短暂地出现一个高峰后，随即下跌。

2019年，越通社发布的涉南海问题英文报道总计436篇。上半年南海事态较为稳定，相关报道数量变化幅度较小，平均每月发布21.7篇报道。

2020年，越通社发布的涉南海问题英文报道总计284篇，数量远远少于2019年。2020年1—3月，相关报道数量持续下跌，平均减少48%。3月，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越南国内月内南海相关英文报道只有6篇，为两年来的最低值。

（二）报道主题分类及特点

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中认为，主题（theme）是文本内容或意义的特征之一。主题具有全局性、宏观性的特点，是一个文本最重要的信息。主题之下包括若干小命题，需要通过删减、概括、组构的原则对其进行提炼。^①通常情况下，标题显示了新闻话语的主题，是内容的凝练。在不同的主题下，新闻标题可以作为内容维度的分类依据，将新闻信息归类到相应的主题范围。

^① 托伊恩·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曾庆香译，华夏出版社，2003，第29页。

在以国家作为主体的单元层次上，按照主题分类，2019年和2020年越通讯社涉南海问题的报道可划分为基于国家利益的“越南安全”“越南经济”“越南政治”“越南历史”，以及基于国家间互动的“多边外交”“双边外交”“国外态度”“越南态度”这几大主题。通过对新闻标题与新闻内容的分析，并将新闻报道按照上述主题进行归类，则得到以下统计（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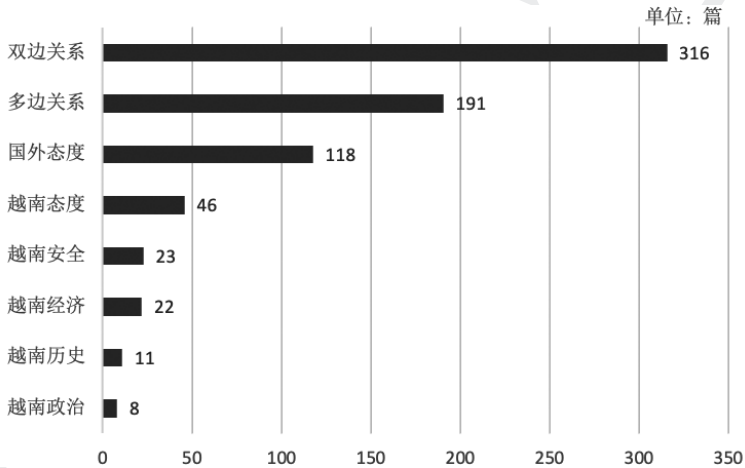


图2 2019年和2020年越通讯社涉南海报道主题

由图2可以看出，“双边外交”报道中提及南海问题的次数最多，达到316篇；其次是“多边外交”报道，共191篇报道提及南海问题；“外交”主题合计507篇，约占总数的70%。

关于南海问题的“国外态度”报道有118篇，多为转引外国领导人与学者关于南海问题的观点与言论；“国内态度”报道只有46篇，主要是越南外交部发言人代表越南官方对南海问题的表态。由此可见，越南更加倾向于通过强调域外大国对南海问题的立场向中国施加压力，以此避免官方直接表态引起中方的警惕。此外，越南还弱化了对中国政府处理南海问题的立场与政策的报道，形成了以越南为视角构建的主题框架。

以越南国家利益划分的“越南政治”“越南经济”“越南安全”“越南历史”等主题的报道共64篇，只占总数的8.9%。其中，“越南安全”主题报道有23篇，数量相对较多；“越南政治”主题报道只有8篇，是数量最少的。

（三）报道的倾向性分类及特点

媒体报道倾向反映了媒体所持立场、态度，媒体通过对事实的选择和语言修辞表达对报道主题的情感倾向。通过筛选出直接提及中国的越通社涉南海问题的英文报道，并将这些报道以中国为针对对象划分为积极、中立和消极三种态度倾向，有助于考察隐匿于态度倾向背后的越南官方对南海争端中的中国角色认知。

在越通社涉南海问题的英文报道中，直接提及中国的报道有194篇。其中，态度积极的有42篇，主要集中于中越双边会议或是中国—东盟会议的报道，强调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态度中立的有39篇，表述中国与东盟应当共同促成“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态度消极的有119篇，主要是转引外国学者或者官员对中国在南海进行合法活动的谴责，或者是越南外交部对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活动表示抗议。总而言之，在2019年和2020年的越通社涉南海问题报道中，对中国的消极态度倾向所占比例平均为58%，对中国中立与积极的态度倾向平分秋色，各占20%左右（见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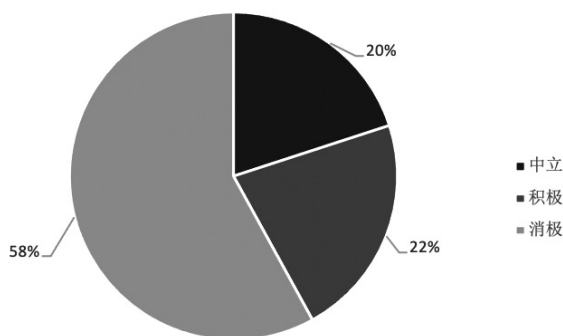


图3 2019年和2020年越通社涉南海报道对中国的态度倾向

将不同态度倾向的报道按照时间进行排序，可以发现，2019年和2020年越通社涉南海英文报道中提及中国的报道数量与报道总数量的变化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在报道量高发的月份，相应的积极、消极、中立报道量均增多。其中消极报道量的变化受外部事件的影响最大。越通社的每月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为不同态度倾向的组合。只在2019年2月没有直接提及中国的涉南海问题报道，在2019年9月和2020年的3月、4月、8月和10月的涉南海报道中，提及

中国的报道只有消极倾向（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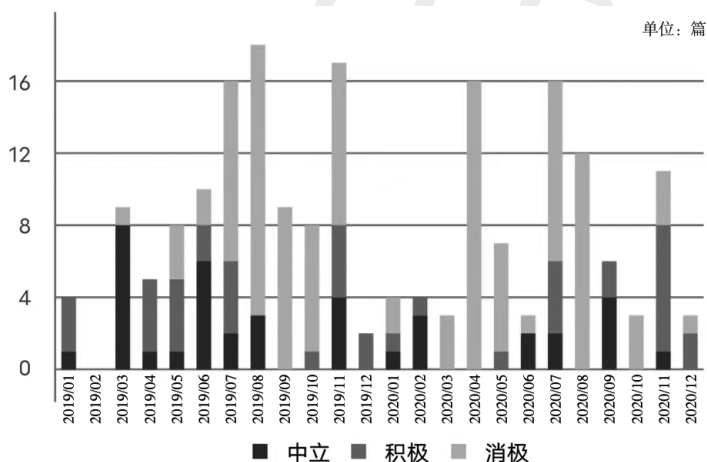


图4 2019年和2020年越通社涉南海报道对中国不同态度倾向的变化

三、对越通社涉南海英文报道的质化分析

（一）结构分析

新闻文本并不是把各种相关事项简单地堆砌组合，而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将各项要素进行排序，形成新闻的图示结构，从而达到强调、凸显新闻主题的目的。梵·迪克认为，新闻图式可分为五个范畴：第一个是概述，即新闻标题和新闻导语；第二个是情节，即语境中的主要事件和背景；第三个是后果，即重要事件发生之后的行动及事件；第四个是口头反应，即新闻事件的重要参与人或显要政治人物发表的言论；第五个是媒体自身的评论。^① 无独有偶，臧国仁的框架结构层次理论也将新闻的图式结构作为框架的中层结构，并将之分为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归因与评估。^② 参考上述理论，2019年和2020年越通社涉南海英文报道可按照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口头反应与评价六个方面划分，得到关于图示结构分析的统计（见表1）。

① 托伊恩·梵·迪克：《作为话语的新闻》，第96页。

② 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台湾三民书局，1999，第24页。

表1 2019年和2020年越通社涉南海问题英文报道的图式结构分析

主要事件	先前事件	历史	结果	口头反应	评价
36.12%	6.27%	6.25%	1.02%	49.23%	1.12%

从表1可以看出，越通社发布的相关报道在图式结构中主要集中于事件与口头反应两部分，对于事件结果与媒体评价两部分描述最少。

在主要事件部分，越南更加偏重于报道自身的行为，较少描述中国的活动。关于中国在南海的活动通常穿插于越南官方态度的报道中，作为先前事件引出新闻主要内容，为越南更好地阐释立场与政策服务。越通社的报道在主要事件部分更多呈现的是越南与其他国家展开外交活动，并在不同外交场合就南海问题发表意见，几乎看不到中国视角的描述，越南官方视角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口头反应在图式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且口头反应主体以越南官方为主。越通社发布的相关报道中，口头反应接近一半，甚至高于主要事件，体现了重言论的报道方式。越通社作为越南官方媒体，首先发挥了媒体的告知功能，除了让受众了解中越南海争端的情况与进展，更加入了大量的口头反应，引导受众了解与接受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态度，推进舆论引导的作用。同时，越通社的相关报道也大量引用了其他国家官员、专家和学者对南海问题的分析与观点意见，其中多数来自俄罗斯、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等第三方国家。来自不同主体的多元口头反应，使得越通社在报道南海争端时貌似听取各方意见，但这种表面上“多元”的背后是经过筛选的并非客观的报道框架。

（二）策略性叙事修辞

在当前国际传播中，策略性叙事成为一种具有解释力的工具，被视作21世纪“软实力”的一种表现，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既具有解释扩散的功能，又具有意义赋予和观念生产能力。策略性叙事在沟通过程中“包装”原有的内容，通过强调一部分内容进而隐藏另一部分内容，使叙事以特定的形态呈现出来，从而控制受众按传播者希望的方向去完成对某个议题的理解。为了完成这种“包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塑造受众对议题的理解，策略性叙事需要搭建一整套关于“故事”的要素。在分析美国媒体的策略性叙事时，有学者归纳出策略性叙事的四类主要要素：人物与角色、布景与语境、情节与冲突、结局与

解决方案。^①通过对策略性叙事修辞的分析,有助于挖掘越通社作为越南官媒在策略性叙事中所塑造的故事。

从人物与角色的角度来看,通过对越通社涉南海英文报道的统计可看出,越南作为报道主体,预先设定了强者、弱者、守法者、破坏者、正义者与合作者等不同的角色类型,并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需要,在南海争端的故事中为不同国家拟定相应身份。越南将自己塑造为一个守法且友善,同时却又受到侵犯的受害者形象。

在策略性叙事的布景方面,越通社将南海问题置于国际舞台之上,频频在双边会议和国际会议中抛出南海争端这一议题,并且指出如果南海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将会影响地区安全,甚至是国际安全,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在南海问题被嵌入国际舞台的布景后,国际社会的共识与共同价值被引入其中,成为解决南海问题的重要前提。于是,越南方面将南海问题紧密地与国际法规捆绑起来,有意使之在无形中成为限制南海问题话语的语境,有助于强化其所构建的南海话语合法性。当南海的合法话语占据主导权后,其叙事内容自然获得定义权、阐释权,并进入框架推理装置的建构路径中。

在积极倾向的报道中,越南描述了中国与越南的密切合作关系,并且强调越方是倡导发扬合作精神、和平解决争端的积极一方。2019年7月12日,越南国会主席阮氏金银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越南表示愿与中方共同解决南海问题,为两国关系可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②2020年9月10日,越中北部湾港口外海域工作组第十三轮磋商和越中海上合作共同发展磋商工作组第十轮磋商通过视频方式进行,在友好的氛围中,双方就近来的南海局势进行了讨论,并就认真遵守国际法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意避免采取使南海局势复杂化的行为。^③

决定策略性叙事有效性的关键一环是明确的结局与解决方案,它使价值观的输出形成一个具有逻辑的闭环。

① 史安斌、廖蝶尔:《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路径重构研究》,《现代传播》2016年第10期,第25页。

② “Vietnamese NA Chairwoman Meets Top Chinese Party and State Leader,” June 13, 2019, <https://en.vietnamplus.vn/vietnamese-na-chairwoman-meets-top-chinese-party-and-state-leader/156032.vnp>.

③ “Vietnam, China Hold New Round of Negotiations on Sea-Related Issues,” September 10, 2020, <https://en.vietnamplus.vn/vietnam-china-hold-new-round-of-negotiations-on-searelated-issues/182771.vnp>.

四、越南对华策略的对冲特点

从对越通社涉南海英文报道的量化与质化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南海问题上，越南对华态度在积极、中立与消极之间的频繁转换是一种常态。也就是说，越南的对华态度是动态性的，并不会长时间维持在一个稳定状态。这种变化投射在对华策略层次上，反映出越南不会固定于追随、制衡、中立、拒绝等单一策略倾向，这至少说明越南对华策略具有较为典型的对冲性。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从马来西亚学者郭清水、新加坡学者古贺庆和中国学者王玉主关于“对冲”概念阐释的主张出发，结合越南官方媒体话语把握越南对华的风险认知、策略构成特点，才能客观有效地评估越南对华策略给中越关系和地区形势带来的影响。

（一）越南对华的风险认知

关于“对冲”的定义，国内外学界尚存争议。马来西亚学者郭清水、新加坡学者古贺庆倾向于从“风险”的角度阐释对冲概念，^①而中国学者王玉主则更明确地提出应回归金融学本义的角度来理解对冲概念。^②上述学者的主张表明，要理解越南对华策略的对冲性，首先要把握越南对华的风险认知，这一认知通过越通社涉南海问题英文报道的数量变化和态度倾向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

首先，就认知变化而言，从越南相关报道数量呈波动性变化不难看出，越南对华的风险认知是确实存在的。南海问题作为中国与越南尚存领土争议的议题，是越通社包括越文、英文、中文等各种语言文字版本报道内容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越南对南海问题及其风险的定位。也正是由于这一定位，即南海问题是触及越南国家利益根本的问题，作为越南官方喉舌的越通社才对这一问题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在南海地区态势呈现升温趋势

^① 详见 Kuik Cheng-Chwee, “The Essence of Hedging: 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0, no.2(2008): 163; Kei Koga, “The Concept of ‘Hedging’ Revisited: The Case of Japan’s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East Asia’s Power Shift,”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 Iss.4 (December 2018): 633–660, <https://doi.org/10.1093/isr/vix059>, accessed December 29, 2017.

^② 参见王玉主：《对冲策略及对中国—东盟关系的意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期，第22—50页。

时，其报道数量迅速达到波峰，而在态势减缓过程中并不会迅速降至波谷，通常呈现出波峰、波谷交替反复的现象。

其次，就认知强度而言，在提及中国的涉南海问题报道中，负面倾向过半，表明越南对华风险认知维持较高强度。与此同时，尽管相关报道的态度倾向偏向消极，但也存在着中立与积极的倾向，由此可推知越南对华风险认知强烈，但总体而言并不极端。这一特点在结构分析和叙事修辞方面也得到直接体现。越通社采用突出口头反应的报道结构，通过重复和转引越南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或者国外专家、学者和官员的评论，把官方和来自第三方的声音混同。可见，越南对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异常敏感，并将自己的主权不安全感投射到外界，形成了对中国较为强烈的风险认知。与之相对，中立倾向报道的文本中，往往避免直接提及中越两国的南海争端或使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而是简要地陈述在会议中各方重申应遵守国际法妥善解决南海问题，中国与东盟应继续加快谈判以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在积极倾向报道的文本中，越通社则使用了中越双方互为合作者的策略性叙事修辞，多采用类似“越方对两国政党和国家的关系呈现积极发展势头给予高度评价，重视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并提议在坚持遵守国际法基础上和平解决海上问题……中方也强调巩固中越传统友好关系，管控好分歧，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并支持越南在各多边机制上发挥积极作用”的模式化表述。这种表述模式表明，中越传统的友好关系以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越南对中国的风险认知强度。并且，越南积极响应通过制定区域性质的法规来解决南海争端，说明越南认为与中国之间有谈判与商议的空间，中国的活动并未给越南的国家安全带来足以影响其生存的风险，双方存在合作的空间。

综上所述，越南对华风险认知与中越地缘关系密不可分，而这种认知或已由来已久。在越南的汉文古籍《大越史记全书》中记载了赵佗建立南越国的历史，其中有该书前身《大越史记》的作者黎文休的评注：“黎文休曰：辽东微箕子不能成衣冠之俗，吴会非泰伯不能跻王霸之强。大舜，东夷人也，为五帝之英主。文王，西夷人也，为三代之贤君。则知善为国者，不限地之广狭，人之华夷，惟德是视也。赵武帝能开拓我越，而自帝其国，与汉抗衡，书称老夫，为我越倡始帝王之基业，其功可谓大矣。后之帝越者能法赵武，固安封圻，设立军国，交邻有道，守位以仁，则长保境土，北人不得复恣睢也。”这段评注表明，至早在13世纪，安南封建朝廷就已经产生关于“华”的风险思

考。毕竟陆路与海路相接，且“华”又强胜于“夷”，如何长保领土至少应是和王权同等重要的朝廷大事。所以在摆脱郡县统治形式后，安南历代君王都恪守宗藩体系的仪轨与义务，而史官也在官修史书中将能否处理好与“宗”的关系作为评价君王的标准之一。《大越史记全书》编修者吴士连，即15世纪后黎朝的史官，在评价李朝太祖时将“南北通好”作为“可见其有帝王之畧”的依据。^①这或可视为封建时代安南对华风险认知与策略的雏形。西方带来契约制度以代替宗藩体系后，面对世界变局，越南对华风险认知在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与美苏冷战的冲击下渐显，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发生的两次海战与边界战争难以单一地归因于时局因素。即使在中越陆地边界与北部湾划界尘埃落定之后，越南进一步修订《海洋法》《边防法》等，推动落实“海洋战略”“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并将之上升为保卫国家利益的层面，构建边疆、海岛文化体系等，这从某种角度上反映了越南对于地缘风险增而不减的认知。

（二）越南对华策略的构成

越通社涉南海问题报道的主题分类与统计显示，外交主题下的报道数量最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越南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并拒绝主导性国家出现，通过建立外交上的联合或者在地区和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谈判的方式，在南海问题上试图构建对中国的有限制衡。在外交主题下，关于双边外交、多边外交、国外态度的涉南海报道数量位列前三名（见图3），而有关国内态度以及各领域的涉南海报道数量明显减少，反映出越南在策略构成方面以多面下注、对华间接制衡为主要特点。

在双边外交主题之下，报道数量降序排列依次为越美、中越、越日、越俄、越南与东盟几对外交关系。在越美双边外交报道中，外交主体多为两国政府高级官员，南海问题大多出现在报道内容的结尾部分，处于并不显眼却也不能忽略的位置。在这类报道文本中，越通社利用美国领导人或是高级官员的发言来支持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强调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与《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来解决南海争端以扩大其南海声索主张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同时以维护南海的安全、稳定与航行自由的名义将美国引入中越南海争端，通过肯定“越美国防安全合作对于维持和平、应对区域和国际安

^① 孙晓主编《大越史记全书》（一），人民出版社，2015，第49、161页。

全风险的成效”，^①借美国之力加强对华制衡以抵消地缘安全风险。由于日本、东盟是美国盟友，越南在涉南海的双边外交报道上也体现出类似的内容与逻辑，一方面强调国际法对于解决南海争端的准绳地位，另一方面在肯定并主张强化双边合作关系的同时，突出对方就南海问题对越南立场的支持以及未来加强海上合作的前景。

相比之下，在越俄双边外交报道中，除了关于俄罗斯支持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肯定双方国防合作的支柱性地位、肯定双方在共同促进油气勘探和开发方面的合作成果是必不可少的内容。越俄双边外交报道呈现出与越美双边外交报道不同的内容与逻辑，一定程度上受到历史关系的影响。早在冷战时期，越南与苏联就在国防与能源方面展开合作。1978年11月，苏联与越南签订《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在1979年2月第三次印支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发表声明称“苏联将履行《苏越友好合作条约》应承担的责任”，并向越南派遣军事专家组，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②而苏联太平洋舰队常驻金兰湾，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后撤出。之后，俄罗斯成为越南武器进口的重要来源国，尤其自2001年以来，越南先后向俄罗斯订购了“针-S”便携式防空导弹系统、S-300PMU1防空导弹系统、K-300P Bastion-P20移动式海防导弹系统、32架苏-30MK2战机、6艘“基洛”级潜艇、2艘“猎豹3.9级”护卫舰等。在能源领域，1981年苏联海外石油公司与越南国家石油公司合作成立越苏石油公司，开始开采越南南部大陆架油田。截至2020年，在此处已开采原油24亿吨，销售额超过830亿美元。^③越俄还通过签订多个能源合作协定强化海上利益共享，其中涉及中越争议海域05、06区块，因中国抗议而暂停开采。

在多边外交主题下，数量最多的是与东盟相关的报道。越南以东盟为平台推进东盟国家对南海问题共识的形成，并寄希望于以东盟共同体的声音提出南海争端的解决办法。典型的结构与叙事可以越南总理阮春福参加第36届东盟峰会报道为例，阮春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南海的和平、安全与稳定是东

^① “Activities Launched to Mark 25 Years of Vietnam-US Diplomatic Ties,” January 31, 2020, <https://en.vietnamplus.vn/activities-launched-to-mark-25-years-of-vietnamus-diplomatic-ties/167970.vnp/>.

^②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М.Д. Роль СССР в отражении агрессии Китая против Вьетнама в 1979 г.// Юго-Восточная Азия: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азвития. 2014. №.12. С. 133. 转引自吕雪峰：《南海争端中的苏联/俄罗斯因素》，《俄罗斯研究》2016年第1期，第190页。

^③ Pero Times, “Vietsovpetro-10 thành tựu ve vàng,” December 12, 2020, <https://petrovietnam.petrotimes.vn/vietsovpetro-10-thanh-tuu-ve-vang-589783.html>.

盟各国的共同利益和愿望，重申了东盟国家共同推进南海合作、发展与安全的决心。^①此外，越通社还积极报道越南组织和参加与南海问题有关的国际研讨会，并转引各国专家学者对南海问题的观点，从学界获得其主权法理依据的支持。

由此可见，越南试图在安全层面拉拢域外大国为越南的立场背书，以此牵制中国在南海的活动；与俄罗斯共同开展油气开发活动，将俄罗斯的经济利益与南海资源捆绑，使之无法置身事外；以东盟会议为平台，致力于推动东盟国家形成一致的南海问题立场；还利用与南海问题相关的国际研讨会，为自己的主权声索争取理论上的支持，形成对中国的舆论优势。但是，有关中越外交的涉南海报道采用类似“肯定两党两国友谊，为双方继续谈判寻求逐步解决南海问题的途径创造前提和建立互信”的模式化叙事，侧重于突出中越双方的经济合作关系，表明越南在对冲地缘安全风险的同时在经济层面不会放弃从中国获得经济利益。这种拉拢域外国家制衡中国、依托东盟增强对华优势，同时保持与中国合作的多面下注策略结构，也反映了越南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尽可能保持平衡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动机。

（三）越南对冲性对华策略的主要影响

越南采取具有对冲性的对华策略，受到直接影响的即是中越关系。一方面，这种对冲行为来源于地缘安全意识：由于两国的地理位置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这种基于地缘而产生的安全意识便具有了长期性与客观独立性，而且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华夷观的作用下，越南难以避免产生对华的风险认知并陷入地缘安全困境。由此，越南在对华策略构成中必然采取制衡措施，以对冲越南所认为的中国带来的地缘风险。而在大国关系重组的背景下，越南对中国的制衡则通过拓展全方位外交以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友的联系这一方式来实现，尤其在南海问题上，有意识地促使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国家介入，借助国际社会舆论形成对华优势等都是越南制衡中国的具体表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中越关系的良好发展造成阻碍。另一方面，尽管越南对中国的风险认知很强烈，但并不极端，而且越南也通过各种场合表达对中越传统友好关系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良性认知与重视，这也表明越南在具有对华风险认知的同时，也充

^① “PM Nguyen Xuan Phuc: 36th ASEAN Summit a Success,” June 26, 2020, <https://en.vietnamplus.vn/pm-nguyen-xuan-phuc-36th-asean-summit-a-success/177596.vnp/>.

分认识到中国所能带来的利益尤其是政治与经济利益对越南国家发展的价值与意义。由此，在对华策略构成中，制衡措施更多的是以间接制衡为主，而与中国接触、合作则是具有长期性的关键组成部分。这对于中越关系未来的良性发展而言无疑是积极且重要的保障。就这一角度而言，越南对华采取的对冲性策略，对中越关系的发展不会产生实质性的负面效应，未来中越关系不会摆脱“南北通好”的历史轨道，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和精心培育的友谊对中越关系发展仍将起到主导作用。但是，在具体层面的互动中，例如容易引发越南对华风险认知升级的南海问题、军备问题等层面，越南将继续利用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合作加强对华制衡的资本与实力，这也成为中越增进互信与合作的重要挑战。

在地区范围内，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还有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东盟成员国，它们也是越南对华制衡措施拉拢的重要对象。2020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越南借助所享有的话语权，试图推动东盟成员国形成关于南海问题的统一认知，客观上对增进东盟的内聚力具有一定作用。此外，越南积极利用东盟平台，通过“东盟+1”“东盟+3”等多边机制，在加深与中国经贸合作的同时也推动多边经济合作发展，尤其重视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有助于突出和增强东盟在地区的中心地位。在中美权力转移的变局下，东盟于2019年推出《东盟印太展望》，旨在强调以东盟为中心和东盟合作机制的重要性，促进东盟一体化建设的同时聚焦经济发展，加强合作并反对对抗。通过《东盟印太展望》，越南可依托东盟平台在系统层次上对冲选边站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即使在国家单元层次上面对选边站风险，越南也可以回归到“东盟+X”的多边机制下实现对冲。而在国家单元层次上，无论是借助西方势力在南海问题上制衡中国，还是利用双边与多边机制深化对华经济合作，越南也在不断寻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与《东盟印太展望》所反映的多边主义主张基本吻合，对增强东盟共同体的中心性与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五、结语

通过对2019年、2020年越通社涉南海问题英文报道的梳理与分析，笔者从外交话语研究的角度确定了越南对华策略具有对冲性，目的在于对冲历史上业已存在的地缘风险。就其特点而言，越南对华风险认知难以消失，强烈而不

极端；策略构成则包括借助外力间接制衡中国，同时拓展全方位外交政策全面下注。鉴于南海问题难以在短期内有效解决，中越围绕南海的岛礁争端仍然存在激化的可能，越南对华的对冲性策略仍将是其多边外交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趋势从越南在第39届东盟峰会及系列双边、多边会议中的表态亦可窥见一斑。

这种具有对冲性的对华策略一方面对中越关系良性发展造成阻碍，但另一方面也因为中越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双边合作机制，其阻碍作用得到限制，不会导致中越关系脱离传统轨道。这也说明，虽然越南陷入地缘安全困境，但正如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会见越共中央总书记特使黎鸿英时所强调的，“邻国是搬不走的，友好符合双方共同利益”，^①通过进一步加强中越双边互信与合作，有利于淡化越南对华风险认知，促使中越关系在传统轨道上继续良性发展，进而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发展局面。

^① 《邻国是搬不走的，友好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国青年报》2014年8月28日第1版。

Research on the Hedging of Vietnam'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from Vietnam's Propaganda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YANG Yang

Abstract As the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of East Asia and strength comparison of major countries, Vietnam has been keeping on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cooperation with China while continually advancing the security collaboration with countries like the US with an eye on balancing China. By research on Vietnam's propaganda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in 2019 and 2020, it can be judged that Vietnam'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is hedging geopolitical risk. Vietnam has a strong but not extreme sense of risk, and its strategy mainly includes indirect balancing and comprehensive betting. This strategy has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but it is also restricted by the bilater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esides, it is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proposition of multilateralism reflected in the ASEAN Indo-Pacific Outlook, and to some extent useful to strengthen the centrality of the ASEAN community and the stability of Southeast Asia.

Keywords Vietnam; the South China Sea; propaganda; hedging

Author YANG Ya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researcher of College of ASEAN Studies.